

名家专栏

灶台上的经典

梁衡

梁衡，《当代贵州》杂志顾问，新闻理论家、散文家、科普作家和政论家。曾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职。

1968年底，我大学毕业从北京分配到内蒙古临河县。按照当时的政策，刚来的大学生要先去农村劳动一年。我们四个北京、上海等地来的大学生睡在一条土炕上，白天出工劳动，收工后自己做饭，形同知青。一天拉着风箱烧火时，在灶台上发现一本已经撕去封面，准备引火的旧书，是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这本书堪称经典，是中国修辞学的开山之作，作者更是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翻译者。当时是“文革”书荒的年代，正无书可读，我如获至宝，从头到尾细读多遍，还作了笔记、摘抄。这本书对我日后的写作和工作帮助很多，有两个小故事，可证其经典的作用。

一是书中谈到一个观点。修辞学有两大分野：一是消极修辞，强调客观性，概念准确、逻辑严谨、语言朴实，如应用文；二是积极修辞，强调主观的情感，生动、夸张、浪漫，如文学作品。劳动一年之后我即参加新闻工作兼文学创作，再未有变。未想到30年后中国新闻界出现一股消息散文化的写作思潮，一些权威人士也表示支持。大约是觉得新闻枯燥，不如文学好看，就向散文化寻找出路，为此《新闻出版报》还开展了长达半年的大讨论。当时我已在中国新闻出版社工作，讨论结束时报社社请我写一篇结论文章。我即想起陈望道先生关于修辞两大分野的法宝，指出新闻的本质是信息，属消极修辞；文学的本质是艺术，属积极修辞。两者不可混淆，消息不能散文化。否则新闻将失去客观性，而带来虚构、夸张、浪漫的毛病，新闻将不是新闻。从此一锤定音，复归平静。书到用时方知好，经典一句抵千军。

二是本书在论述文章风格时引了一篇例文，是日本作家高山樗牛散文《月夜的美感》，由20世纪30年代名家夏丏尊先生翻译。文字之美当然主要是译文的功劳，但原作罕见地用逻辑思维的推理方法书写形象的美感而生奇效。比如，他说月亮的颜色为青色，又层层解剖青色从而得出月色的美。我当时为之心动，在土炕上将它手抄于本子上，反复诵读，时时品味。20年后我写了一篇赏析文章《一篇少见的推理散文》，发表后引起反响，竟有同好者搜求寻觅，补齐了原书未录入的部分，《名作欣赏》杂志不吝篇幅又将原文完整重发一遍，成为一段佳话。在创作实践上我仔细研习此法，先是写了一篇散文《夏感》，很快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沿用30多年。但我心犹未甘，唯恐此法失传，继续深耕，如临古帖，不厌其烦。2018年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线条的美感》，随后被选为2020年的高考试卷（天津卷），其时距我在乡下初读此书已经过去了52年。

冷炕上偶读一本书，半个世纪不能忘。就好像一座巴颜喀拉山，同是长江、黄河的源头。《修辞学发凡》是我新闻与文学写作的共同起点，并曾经是我工作的指南。

什么是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不管是为文还是做事，要成为经典有三个条件：一是达到空前的水平；二是已超出自身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可以指导实践；三是经得起重复，不断地释放潜能，可以被反复地引用和检验。

永寄热心兴明月
风直到夜郎西

李太白诗句

贵州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张达书



《信仰之光》

■ 凤冈县中等职业学校 杨惠倩
指导老师：邓宇

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贵州故事

■ 丁凤鸣

丁凤鸣，贵州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秘书长，贵州省红色文化重点建设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处处长、省文化和旅游局文物保护与考古处(革命文物处)处长，长期从事党史研究、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和红色旅游促进工作。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国文物报》《贵州社会科学》《贵州日报》等发表学术理论文章数十篇，主编、参编著作十余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抗战期间，来自国际社会的反法西斯力量汇聚贵州，共同书写了精彩的抗战故事。

二十四道拐：南洋华侨机工队的家国记忆。晴隆二十四道拐于1936年初步建成，后在美军帮助下进行过维修，先后投入省内民工达5万多人、士兵3万多人，是滇黔公路重要节点，总计有45万吨抗战物资经此转运到重庆或前线。当时，国内急需驾驶员和修车技术人员，在爱国华侨陈嘉庚号召下，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等地的3000多名机修工人，踊跃报名参加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槟城华侨筹賑会职员白雪娇在来信中说：“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姊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在当时被广为报道。滇缅、滇黔地区山路崎岖，且时常遭受日机轰炸，因此在转运抗战物资中牺牲的华侨机工竟达三分之一。

图云关：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国际情怀。1937年底，中国红十字会会在汉口组建救护总队，新加坡华侨林可胜为总队长，1939年武汉失守后迁往贵阳图云关，抗战期间做了11.9万例手术、门诊平民200余万人次。其中有“国际援华医疗队”这样一支特殊队伍，由波兰、罗马尼亚、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10个不同国家26名医务人员组成，绝大多数是国际共产党员，他们和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留下了许多感人事迹。英国女医生高田宜，为防止鼠疫竟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不幸感染病毒而牺牲在此。德国医生白乐夫后来在《我在中国做医生》中说，他感到最幸福的时刻是：“当我

为奄奄一息的垂危病人输液时，病人苍白的脸随着液体慢慢地进入静脉而变红，并渐渐复苏过来。”

旧州机场：美军飞虎队的烽火青春。黄平旧州机场于1942年建成(一期)，最初是芷江机场的临时加油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提供物资和技术人员，中国提供土地、食物和劳动力，进一步将其扩建为甲级机场，设有正副跑道、停机坪、滑行道、弹药库、兵营等。为修建该机场，前后征调省内民工达10万余人。自1943年秋后，在美国空军飞虎队队长陈纳德支持下，中美两国飞行员组成第十四航空队，从旧州机场起飞作战，先后攻击湖北武汉、广西河池、湖南衡阳等地日军，击毁日机200余架，战绩非常可观。

和平村：在华日本人民反法西斯革命同盟的特殊阵地。和平村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政部设立的教育、改造日俘的第二俘虏收容所别名，1938年2月成立于湖南常德，12月迁至贵州镇远。1941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民政府军政部副部长周恩来和军政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推动下，日本共产党员鹿地亘和妻子池田信子组织收容所里的日俘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法西斯革命同盟镇远和平村训练班”，编写反战日文刊物，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到抗日前线喊话等，成员从最初的50余人扩大到150人左右，在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抗战期间，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及时将有关援华物资转运到重庆、延安等地，积极支持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特别支部工作，负责接洽转移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等重要人士，在凝聚反法西斯力量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上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等各种反法西斯力量，在贵州大地上书写的感人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南诏陷播

■ 周必素

周必素，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博研究馆员。一直从事文物保护及播州杨氏土司历史、考古研究。有《播州杨氏世系考》《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研究》《贵州遵义的宋代石室墓》等相关成果。

隋末唐初，今云南洱海地区有6个实力较强的小国，被称为六诏：蒙诏、越诏、浪穹诏、寻南诏、施浪诏、蒙舍诏。而位于最南面的蒙舍诏势力最强，在唐王朝的扶持下，灭了其他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朝廷封蒙舍诏主皮逻阁为云南王、越国公，赐名蒙归义，建立南诏国。南诏位于唐和吐蕃之间，唐朝扶植南诏的目的是想联合南诏与吐蕃抗衡，以保西南边疆安全。但随着南诏势力的发展，在天宝年间至唐末(750—875年)时期，南诏在吐蕃与唐朝之间摇摆，并发生了3次大的战争。

第一次是唐玄宗天宝末年，南诏脱离唐朝投靠吐蕃，并在安史之乱期间夺得了云贵高原大部。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唐朝击败吐蕃、南诏联军，吐蕃、南诏之间裂痕加大。唐德宗时，剑南节度使韦皋招降南诏，与之结盟，共同打击吐蕃。

第二次是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南诏侵犯四川，攻下成都外城。李德裕到成都代替剑南节度使杜元颖，恩威并施，与南诏立约，南诏再次归附。

第三次是在唐懿宗、僖宗时期，南诏又向南、向北、向东侵犯。向南打到了广西邕州等地区，被安南都护高骈击败；向北即对四川、成都地区的大渡河之战，唐军溃败，朝廷于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发动河东、山南西道、东川兵援救，命高骈赴西川，平定了南诏。而南诏这次对黔中地区的东侵开始于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其中有两次战事涉及到播州。

第一次战事在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大中十三年(859年)八月，唐宣宗因服长生药中毒，于大明宫驾崩。唐

朝派遣使臣去南诏告哀，恰逢南诏第七代国王劝丰佑去世，其子世隆(又名首龙)袭任第八代国王。世隆凶狠悖慢，安置唐朝使者于外馆，礼遇不周，也不遣使到长安吊祭。唐朝使者返回长安后，把在南诏遭受的冷遇悉数汇报给了唐懿宗。唐懿宗以世隆不遣使者来朝控告，也没有告知朝廷其父劝丰佑之丧，而其名字的“世隆”两字又犯了唐朝两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的名讳，决定不给他进行“册封之礼”。世隆于是背叛了唐朝，自封为皇帝，国号大礼，改年号为建极。世隆一生好战，自859年至877年在位期间，几乎年年都有战争。建极元年(859年)，派遣大将军独屠侵播州，又侵武州，皆获胜。建极二年(860年)，攻安南、邕州，再获胜。但这次播州失守，很快被收复。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年)九月，“安南都护李鄣复取播州”。

第二次战事在乾符元年(874年)。此次战事，《滇史》《资治通鉴》均有载，《滇史》载“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春，南诏寇黔中，陷播州”，同书又载“蛮至新津而还，回寇黔中。经略使秦匡谋惧，奔荆南”。《资治通鉴》亦载“(南诏)寇黔中，黔中经略使秦匡谋兵少不敌，弃城奔荆南”。《滇史》所记“黔中”应是指黔中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天下为十五道，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黔中道治黔州(今重庆市彭水一带)，领黔、辰、锦、施、巫、业、夷、播、思、费、南、溪、溱、珍、充等州，包括今贵州北部、重庆南部以及湖北、湖南的小部分地区。《资治通鉴》所记“黔南”，应是指黔中道的南部地区。

在南诏的这次东侵中，播州再次失守。

贵州历史文化成因再探

■ 范同寿

范同寿，贵州贵阳人。历史学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出版有《贵州简史》《贵州历史笔记》等著作10余部。

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贵州历史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影响其形成的因素很多。贵州历史文化具有贵州高原喀斯特山地典型特色、多民族和谐共生特色。如果从宏观的角度考察，我认为，它的成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独特自然生态环境造就贵州独特山地历史文化

喀斯特地貌为贵州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绝美境。在贵州高原，随处可见直插云霄的奇峰、峥嵘诡谲的岩石、飞珠溅玉的山泉、云蒸霞蔚的飞瀑、烟波浩渺的湖泊池沼、高古幽深的溶洞峡谷。如此地形地貌，加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量充沛、四季分明的得天独厚的气候特征，将贵州变成了一片神奇的沃土，进而衍生出独具特色的贵州历史文化。

特殊的自然生态与地理环境，加上地区之间“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风”的气候差异，导致了贵州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造就了独特的“文化千岛”与“文化孤岛”现象。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随着交通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这种状况虽在不断演变，但在地形地貌的制约下，各地区、各民族的语言、生活习惯、生产方式、饮食习惯、服饰风格都仍然能穿越时空隧道，顽强地延续着自身的传统，这正是山地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成因之一。

政治因素制约贵州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

这里所说的政治因素，主要是指从先秦之际到民国时期，历代统治者对贵州高原的统治政策。

通过对贵州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因素在贵州历史文化形成过程中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是因为贵州不仅完整经历了我国历史上对边疆民族地区从郡国并存、经制州与羁縻州并存、土司统治与流官统治并存等各种管理制度的实践，还是中国最后一个世袭官制——土司制度的终结地。

明清以来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贵州或与贵州密切相关。如明太祖的调北征南、广设卫所大兴屯田、贵州建设、明初百年官方主导下的大开发、平播之役、王阳明龙场悟道、魏永承历王朝爵居安龙、平定三藩之乱、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贵州省境的定格、青溪铁厂的创办等。民国时期，贵州还是中国革命重要的历史转折地，是抗战大后方及陪都重庆的屏障。由此可见，政治这一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贵州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

生产力因素影响历史文化的形成与传播

贵州缺盐，而盐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物质要素。贵州高原有着数万年人类生活史，人们除了从食物中摄取盐外，不能不从产盐的地方通过交换或买卖获取食盐。先秦之际，川黔之间存在多条盐运的通道。加上秦汉王朝对西南夷的经营，以及尹珍这样的历史人物远赴中原求学、回乡兴办教育等的影响，黔北地区无论在生产力水平、汉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都远胜于南部。

元代推行土司制度，在黔中建立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将贵州城更名为顺元城，筑建土城墙，

强化了对黔中的统治。同时由于元王朝大兴“站赤”(驿站)，修建通往省外的几条干线驿道，今贵阳逐渐成为交通枢纽。自此时起，贵州经济的重心逐渐开始南移。

明朝调北征南，百万以上的军队与家属涌入贵州，“千屯遍布于原野，诸卫错设于州县”，贵州早期的城镇大多在此基础上萌芽。明政府又将贵州都指挥使司设于贵州宣慰司城(今贵阳)，增强了贵阳在省境内的政治地位。随着贵州建省，贵阳成为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治所，加上明初百余年的经济大开发，贵阳作为全省经济、政治中心的地位逐步确立下来。明中叶的开科取士、王阳明的龙场悟道，都强化了黔中地区的文化地位。至此，以贵阳为中心的贵州山地多形历史文化逐渐形成体系。

民族迁徙与族际交流是贵州历史文化构建的主要成因

贵州是人类远古文明的摇篮之一。在今贵州境内，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多达300余处。

古濮人是贵州高原的主要居民，今贵州省的佬族即属古濮人后裔。秦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武帝派唐蒙通夜郎，约为置吏，从而打破了西南夷的封闭状态。之后的“募豪民，填南夷”，从四川迁入一批豪族大姓。这些大姓分布在贵州境内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成为第一批迁入贵州的汉族移民。魏晋南北朝时期，贵州境内出现了几次少数民族的迁徙，成为南方古代四大族系的交汇地。

唐宋以后，随着古代族群向单一民族的演进，贵州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交流日益频繁，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逐渐形成。明初的调北征南，导致汉族人口大量进入贵州。清代的改土归流，统一行政建制，使大批汉族官吏、地主、商贾、工匠接踵而至。

民族迁徙与族际交流是贵州历史文化构建的主要成因。尽管历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始终采取压迫与同化政策，但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下，经过和谐、包容历史文化的长期浸润，贵州各民族反而通过族际间的交往与交流，构建出了各民族既维系着自身优秀传统文化，又在共同的家园过着自我有我、我中有你，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的社会生活。和谐成了贵州历史文化的重要特征，并不断丰富着以山地为主要特色的多彩贵州历史文化。

交通和移民促进独特贵州历史文化的形成

贵州虽然拥有西南地区通道地位的优势，但古代交通却极其艰险。贵州人凭着大山一样的坚强，世代不息地劈山砌石，靠汗水和双足在陡峭崎岖的山间踩出了一条条服务于生产与生活的便道。秦统一六国后，在夜郎地区修筑道路，称“五尺道”，密切了西南与内地的联系。西汉初，已存在一条由四川通往贵州的道路。西汉以后，贵州的通道地位开始显现，汉文化广泛传播，并与贵州土著文化频繁交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不仅凸显出贵州的通道地位，展现出移民在贵州历史文化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唐宋时期，贵州交通条件有所改善，移民增多，族际交流频繁。元朝在贵州境内大兴“站赤”(驿站)，首次将贵州纳入国家交通网络。明初“广设卫所，大兴屯田”及整修四大省际驿道，极大地丰富了贵州历史文化的内涵。屯军及家属的到来为大量贵州城镇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更给贵州留下了许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遗产(屯堡文化)。其后，阳明心学的发端、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闻名遐迩、青溪铁厂的问世、抗战文化的兴盛、红色文化的辉煌，无不与贵州的区位、交通、移民因素有关。